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

——以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为中心的考察

何 凯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20世纪40年代初,为实行“新县制”,国民政府开始推行大规模的县级政区调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这一时期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对相关史实进行梳理和分析后,不难看出,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几个显著的特点: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尽管四川省政府一再催促、强制执行,其时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国民政府在四川推行的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键词:抗战时期;县级政区;政区调整;县界纠纷;插花飞地

中图分类号:K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6-0050-09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606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的地方行政区域调整是在“新县制”建设过程中具体实施。迄今为止,此次地方行政区域调整仍未引起学界的足够关注,仅有武心群、夏军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县制实施后县及县以下行政区域的变更》一文有总体性的概述,该文概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县制”实施后国民政府调整县与县以下行政区域的主要成绩、阻力及失误。在涉及“主要成绩”的内容中,该文提及了“各县县界之勘测与插花飞地的整理”,并指出:“因此举牵涉较多,矛盾较大,大多省、县在实地勘测后,就无法继续实施调整,已调整者计有浙江、安徽、江西、湖南、四川、河南、福建、西康和甘肃等省的少数县区。”^{[1]116}该文在给后来的研究者诸多启示的同时,也因其比较宽泛的研究范围和概括性的论述方式,为其后的相关研究预留了较大的研究空间。在此后的几年中,有关全面抗战时期政区调整的相关研究呈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政区交界地区的“插花飞地”成为关注的焦点;其二,通过个案研究揭示出其时政区调整的成效与不足,并深入认识政区调整所涉及的边界争端、划界纠纷等问题。本文

收稿日期:2020-06-18

作者简介:何凯(1984—),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历史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政治史、中国近代社会史。

基金项目:2017年度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20世纪40年代国民政府在四川的县级政区整理及其纠纷应对研究”(2017BS60);2019年度重庆师范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基础教育的高师历史学专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群改革研究”(201908)。

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拟通过对相关档案史料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论述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基本情况,并总结其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显著特点,试图在“推陈致新”的同时“以小见大”,呈现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复杂面向,进而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得失。

一、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概况

1939年9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1940年3月四川省开始推行“新县制”,整理县行政区域因此被提上日程。当时“新县制”建设的主要地区是抗战大后方,四川尤其起着开全国风气之先的作用。

1940年2月22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在第453号呈文中明言:“现在县各级组织纲要业经明令公布,亟待实施。所有全国各县区域面积之过大过小者,以及人口之过多过少者,似应酌予以划分或加归并,以其(笔者按:应作“适”)应推行新县制之需要”。据此,内政部请求行政院令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西康、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省政府“将所属各县之现时面积、人口确数迅予切实查明备案”,并依照《省市县勘界条例》《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的相关规定,参酌各县人口密度,“统筹具体整理方案及实施时期,一并专案咨部,以凭核办”。1940年3月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第4386号训令,不仅明示“应准照办”,而且令四川省政府遵照办理^{[2]25}。四川省政府遵令而行,随后便拟定了“改划县区、增设县治及整理县界办法”^{[3]74}。1940年5月,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三百八十四次会议决议通过了“改划县区、增设县治办法”和“整理各县县界办法”。前者针对四川省政府辖境内是否“有改划县区、增设县治之必要”提出具体意见;后者就四川境内各县“如何划拨、调整”,特别对与邻县接壤的“凌乱飞嵌及犬牙交错、管理不便各地”提出具体办法^{[4]70-71}。此后,四川省政府将拟定的具体办法咨请国民政府内政部审核。于是,内政部于1940年6月12日回复四川省政府,明确指出四川省政府拟定的具体办法“与省市县勘界条例及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之规定尚无不合,即请照案实施,并将增设县治、整理县界情形随时咨部核办。”^{[3]74}

1940年6月,四川省政府先将其整理、完善的“奉转行政院指示要点”和“省府指示要点”简要陈述,明确说明“改划县区、增设县治及整理县界办法”是“为适应推行新县制之需要”“关系地方行政设施至为重大”,并明令各区行政督察专员“务须深切体会,如限办理具报,勿得视为例文”^{[5]72}。

省府指示传达后,各地开始贯彻落实。此时,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正积极办理“改划县区、增设县治及整理县界”。继此前三次代电之后,十一区专署于1940年7月10日令辖属各县政府“遵照先令电令,赶速办理”“毋再延误”^{[3]74}。同年8月16日,十一区专署在代电中明言:“本省为改划县区、增设县治及整理县界一案,迭奉上峰电令,严催依限妥议具复,本署亦已四次转电各县尅速呈报。”并再次催促辖属各县政府“遵照迭次电令”“于电到三日内将该县区域内各项情形说明,绘成图式,各具二份咨署”^{[6]83}。此后不久,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蒋介石电令十一区专署“严行督饬辖区各县勘明、查确,妥速核议,具复核夺”。据此,十一区专署“再电严催”各县政府将办理情形“迅速咨署”“以凭汇转”省府^{[7]86}。

随后,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区各县先后将具体的办理情况呈报。直到1940年11月,“始据报齐”。各县“所呈意见,大都以相互飞嵌、犬牙交错之地,彼此划拨、调整完善为宜,无改划县区必要”^{[8]20}。显然,其时十一区专署辖属各县普遍认为当地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整、划拨“相互飞嵌、犬牙交错之地”,即如何调整、划拨各县交界地区的飞地和犬牙交错之地。十一区专署辖区内的

八个县中,除岳池县县长谢宝珊报称县界“不应改划”外,南充、南部、蓬安、仪陇、武胜、营山、西充七个县“均各绘具地图及说明,呈请划拨”^{[9]32}。十一区专署依据各县所呈的地图及说明,“另制各县插花飞地图说明表”,附于文后,一并电呈四川省政府^{[8]20}。

二、四川省政府核准各县应当改划的区域

四川省政府接到十一区专署电呈后,于1940年12月11日下发指令,令十一区专署“将有关各县飞插地段详图分别补具二份来府”“再凭核办”^{[10]19}。因此,十一区专署将南部、蓬安、南充、仪陇、武胜、营山、西充七县所呈调整县界地图及说明汇集、整理,再次呈请四川省政府鉴核。1941年3月11日,四川省政府再次下达指令,“分别核示”了四点重要内容,其中第一点便明确指示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该区各县准予改划各地区,经核定如附表(一)(二)。仰即转飭各该县府分别咨商有关各县,派员会勘明确,遵照划拨,并由该区督飭办理。限奉文三个月内,依法交接完竣,分别专案呈明交接日期,贵县新县界详细图说,连同划拨区域内乡镇、保甲、人口、赋税、花名清册呈报来府,以备查核^{[11]24}。

这一重要指令成为日后十一区专署辖属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最重要的法令依据。在四川省政府第06939号指令正文内容后以表格形式详细说明了十一区专署“各县准予改划各地区”,见附表(一)(二),即“四川省政府调整各县县界核准各县应行划出各地一览表”“四川省政府调整各县县界核准各县应行划入各地一览表”。据此二表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四川省政府核准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当改划的区域,具体如表1:

表1 四川省政府核准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调整区域

调整地区	划出县	接管县
四方坡、萧家大梁以北地区	岳池县	南充县
石马山以北之万家沟地区	岳池县	南充县
长五间沟之一段	岳池县	南充县
新龙坝及其附近地区	武胜县	南充县
三县交界边地	武胜县、蓬溪县	南充县
猪巢沟、柯家坝	蓬溪县	南充县
老卜沟及其附近地区	蓬溪县	南充县
邓家沟及其附近地区	蓬溪县	南充县
石岩湾	蓬溪县	南充县
石板沟及其附近地区	蓬溪县	南充县
常罗	蓬溪县	南充县
文潭沟	西充县	南充县
龚家沟	西充县	南充县
嘉陵江右岸地	南部县	蓬安县

汪家湾及其附近地区	南部县	蓬安县
纸厂湾一段地区	仪陇县	蓬安县
潮水坝及其附近地区	仪陇县	蓬安县
王家湾及其附近地区	营山县	蓬安县
大竹沟、陈家沟	南充县	蓬安县
濫院子	广安县	蓬安县
三溪寺	仪陇县	营山县
大垭口	仪陇县	营山县
观音场	阆中县	南部县
回龙店	阆中县	南部县
八庙场	阆中县	南部县
洪山场	阆中县	南部县
城隍垭	阆中县	南部县
三元桥	南充县	武胜县
瓦子场	巴中县	仪陇县
金土地	巴中县	仪陇县
鲜家梁	阆中县	仪陇县
亮垭子	阆中县	仪陇县
王家沟	蓬安县	仪陇县
粉场湾	营山县	仪陇县
唐家碛	营山县	仪陇县
董李二沟	武胜县	合川县
桐子坝、官塘嘴	武胜县	合川县
蓬南场	南充县	蓬溪县
北山寺	南充县	蓬溪县
王太沟	南充县	蓬溪县
乃棠沟、邓家山	南充县	蓬溪县
吊脚楼	南充县	蓬溪县
高观寺	南部县	阆中县
双柏垭	南部县	阆中县

注:本表据“四川省政府调整各县县界核准各县应行划出各地一览表”“四川省政府调整各县县界核准各县应行划入各地一览表”^{[12]26-28}内容整理而成。

该表涉及的应当改划各地,除了包括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辖属各县的接壤地区之外,还包括十一区专署与相邻各专署的交界地区,即第三区专署合川县与第十一区专署武胜县的交界区域,第十区专署广安县与第十一区专署蓬安县的交界区域,第十二区专署蓬溪县与第十一区专署南充县的交界区域,第十

四区专署阆中县与第十一区专署南部县的交界区域,第十四区专署阆中县与第十一区专署仪陇县的交界区域,第十五区专署巴中县与第十一区专署仪陇县的交界区域。

三、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特点

据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总结,1940年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的“插花飞地计四十六处”,1941年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的“插花飞地计九十三处”,1942年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的“插花飞地计一百四十九处”。这三年一共“核定调整”的“插花飞地”多达二百八十八处,遍及川西、川东、川北、川南各县^[13]。其间,四川省政府于1941年3月11日下达第06939号指令,核定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属各县应该调整的区域共44处,约占1940年至1942年四川省政府核定调整县级政区总数的15.3%。这一时期,四川省第十一区专署推行县级政区调整具有一些显著的特点:

第一,县级政区调整主要针对两县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飞地”“嵌地”。此处使用的“插花地”“飞地”“嵌地”这三个概念是由1941年4月四川省政府第10202号训令所定义。其时四川省政府对这些概念的认识与现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主要不同在于对“插花地”的定义。对“插花地”这一概念的定义,当下学界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其争论的焦点是“插花地”与“飞地”二者是否可以等同起来。一些学者认为插花地等同于飞地,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飞地和犬牙之地是插花地的两种基本类型,因而飞地只是插花地的一种类别。然而,1941年4月四川省政府第10202号训令明言:“县与县间,或省与省间,相互插入,而又系犬牙交错之若干地段,曰插花地。”其所谓之“插花地”即是“犬牙交错之若干地段”。从上文提及的二表可以看出,“插入”“深入”“突入”“飞入”“飞越”邻县之地成为此次县级政区调整的重点。“县与县间,或省与省间,相互插入,而又系犬牙交错之若干地段,曰插花地”,不论是“县与县间”的接壤地区,还是“省与省间”的交界地区,“插入”“深入”“突入”邻县之地有“相互插入”的情形,并形成犬牙交错的若干地段,才能被称为“插花地”。再者,“由甲县飞入乙县,而又与甲县整个脱节之地段,曰飞地”,所谓“飞入”邻县之地就是这种情况。在上述两表中有一处“飞越”邻县之地,即纸厂湾一段地区。该地区隶属仪陇县,但位于河对岸的蓬安县境内。因河流隔断,当地政府管理不便,故而该地被认为是应该调整的区域。1941年4月,四川省政府第10202号训令明确指出:“嵌地即插花地之一部分。集若干嵌地即成插花地。由甲县飞入乙县,但与甲县仍可连系,而非整个脱节之地段,曰瓯脱地。”暂且不论“瓯脱地”一词的使用是否恰当,不难看出“插入”“深入”“突入”邻县之地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插花地之一部分”的“嵌地”;二是没有形成犬牙交错的插入邻县的地段^[14]¹³⁹。

第二,县级政区调整致使纠纷迭起。此处仅以位于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境西北的南部县为例,借以说明此次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引发的矛盾与纷争。根据上文提及二表不难发现,县级政区调整涉及南部县和蓬安县的是嘉陵江右岸南部县鲜店乡、富利乡“插入蓬安县金平镇”的区域和南部县河坝乡、王家乡“飞入蓬安县二兴乡”的“汪家湾、戴家坝、鲍家湾、黑堂湾、王紫市沟、官山梁、大小汪家沟、沙地梁、邓家湾、老盐井、燕子湾、坎嘴坝等地”。关于南部县河坝乡、王家乡“飞入蓬安县二兴乡”各地,尽管四川省政府明确指出了应该划拨的具体区域,但仍然有很大的争议。产生纠纷的关键问题是这一地区究竟是“犬牙交错”的“插花地”,还是南部县的“飞地”^[15]⁷⁰。而嘉陵江右岸南部县鲜店乡、富利乡“插入蓬安县金平镇”的区域,不但没有明确指出究竟应该调整嘉陵江右岸两县交界的哪些具体地区,而且如何调整这一犬牙交错的地区本身即是一件令人棘手的事情。1941年5月、1941年7月、1942年4月,南部县和蓬安县三次会勘期间以及1944年3月南部、蓬安两县会同交接期间,按四川省政府法令应当划拨地区的民众抵制县级政区调整的呈文接连不断,各种请愿活动亦蜂拥而起。这一

时期大量反复出现的呈文和请愿说明当时应当划拨地区的民众抵制县级政区调整乃是具有广泛性的行为。在受到抵制之后,四川省政府并未重新审视有关县级政区调整法令的合理性,只是指责士绅、人民既“不明调整县界意义”^{[16]74},又“狃于积习”,因而“不愿划拨”。对此,省府只能一再催促各专署、县府限期“划拨完竣”,并令饬各专员、县长“亟应剴切晓喻”当地士绅、人民,以利推行“划拨插花飞地”和“调整各县县界”^{[17]72},应对显然十分乏术。在传统中国乡村,乡民习惯性的历史认同、因循守旧的保守心理和个人利益的考量等因素形成一种持久、顽固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与四川省政府县级政区调整政策之间的博弈中颇占上风,致使1941年至1944年南部、蓬安两县的县级政区调整无果而终。此外,因南部、阆中两县对双柏垭场管辖权和双柏垭场市息征收权持续多年的激烈争夺,两县政府与两县财务委员会、两县基层官吏、两县市息包商、两县普通民众都因此卷入到此纷争之中,南部、阆中两县绅民由此结下宿怨,难以冰释前嫌,致使南部、阆中两县关于双柏垭地区的调整,“事实上、执行上均有无限窒碍”^{[18]103},直到1944年“双柏垭飞地整划问题”仍被“搁置”^{[19]244},以致成为悬而未决、无人问津的问题。除了政府处理失败致使政区调整无果而终的例子之外,也存在极少数政府强制执行政区调整的例子。相较于上述两个例子,南部、盐亭两县政区调整的过程同样是跌宕起伏、几经波折,有所不同的是南、盐两县于1948年成功地交接了应划拨地区,并划定了新县界。作为成功划定新县界的案例,南部、盐亭两县的政区调整具有其特殊性。尽管如此,仍需强调的是,围绕着如何重新划定南部、盐亭两县新县界,各种政治势力提出了不同的划拨方法,各执一词、据理力争,成为了当时矛盾、纷争的焦点。通过考察立场不同的各种记录、陈述不难发现,南部、盐亭两县政区调整过程中所产生矛盾斗争之错综复杂。

第三,县级政区调整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利益博弈。首先,被划出区域民众对县级政区调整的抵制。民国时期,尽管随着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扩张,体现国家利益的制度、措施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入”乡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能够一呼百应并毫无阻力地“改造”乡村。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具体过程中,按四川省政府法令应划出区域的乡民抵制县界调整的呈文和请愿连续不断。尽管这一时期大量反复出现的乡民呈文和民众请愿中提及各种细节问题时均各执一词,但其行为目的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对于县级政区调整,被划出区域的民众“或素存畛域谬见,或狃于地方积习,或企图保全私人固有地盘利益,因而故为刁难,无理争执”^{[20]83},愤然抗拒。其次,面对县级政区调整,在多样性的利益制约下,基层官吏的行为选择常常因时局的变化和个人的得失而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形:或因有利可图,或因亲故所托,他们有时会与普通乡民一起抵制县级政区调整;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请愿时,他们常常是进退维谷,在上级法令、民众请愿之间摇摆;当县级政区调整涉及多种利益纠葛,甚至卷入地方派系争斗之中时,他们感到如履薄冰;如果县级政区调整涉及个别重要地区的归属时,他们则会奋起争夺利源;除了据理力争、奋起争夺外,他们抵制县级政区调整的惯用手法是故意延宕。再次,各县乡民之间的争斗与县级政区调整亦息息相关。在分析具体史实的基础上,可以将乡民之间的争斗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由于政区界线不清或县级政区调整而引发的相邻两县乡民对生存空间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二是乡民借政区调整之名行派系争斗之实;三是乡民以个人恩怨挑起县界纠纷。第一种类型的典型例子是南部、阆中两县的市息包商和普通乡民围绕着南部县“飞地”双柏垭场的管辖权展开的一系列激烈争斗。1948年南部县富驿乡归盐请愿团的成立即是富驿乡地方政治斗争的失意者借县界调整之名行派系争斗之实的做法,即是第二种类型的典型例子。第三种类型的典型事例如1942年至1949年南部、苍溪两县的县界纠纷。南部、苍溪两县的县界纠纷,不是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县界调整所引发,而是由两县接壤地区“两保长交恶变为两县经界问题”^{[21]50}。

四、结语

1940年8月,四川省民政厅厅长胡次威亲笔致函该省每一名行政督察专员,指出由于1940年5月四川省政府委员会第三百八十四次会议议决通过的“改划县区、增设县治办法”和“整理各县县界办法”“对于时期、步骤均有详细规定,且系兼理主席在省时所决定”,因而应“以最大决心贯彻执行”^[22]²¹。尽管如此,这一时期四川省各县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明显。以位于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境西北的南部县为例,南部县与蓬安县涉及县级政区调整的地区有两处,南部县与阆中县涉及县级政区调整的地区有七处,南部县与盐亭县涉及调整的地区一处,南部县与西充县涉及调整的地区一处,南部县与苍溪县涉及县级政区调整的地区有一处,南部县涉及县级政区调整的地区共十二处。最终只有南部县富驿乡的部分地区划归盐亭县管辖和南部县老鸦乡高观寺划归阆中县管辖,其余十处地区依旧如故,没有任何变动。即使是经过县级政区调整后重新划定县界的两处地区,政区调整过程中的曲折离奇、纠纷迭起及其引发的矛盾斗争亦难以避免。南部县老鸦乡高观寺当地保甲人员,对四川省政府核准应当划入阆中县管辖地区的乡民极其暴虐,“日夜藉拉兵为名,乘机掳抢财物,形同匪徒,任意蹂躏,以致怨声满道”^[23]²¹⁸。这也成为老鸦乡高观寺民众支持县级政区调整和最终划拨成功的重要原因。而围绕着南部县富驿乡部分地区的归属问题和如何重新划定两县的新县界,南部、盐亭两县的县界纠纷历时八年,各种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极其惨烈,甚至时而发生公然械斗,导致当地社会秩序异常混乱。经四川省第十一区专员杨东栢亲自出巡处理,富驿乡的社会秩序才得以恢复常态。由于南部、盐亭两县“县政府处理均有未当”,四川省政府严惩了两县政府官员^[24]。

除了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之外,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其它地区的县级政区调整亦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既有丰都、石柱两县“飞地治理取得较大成效”,又有忠县、丰都两县飞地划拨“不了了之”,还有忠县、石柱两县部分飞地成功划拨和部分飞地仍归旧管^[25]⁹⁶。总体而言,全面抗战时期四川省各县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成效并不显著。1946年9月,四川省政府不得不承认:“近年以来,各县因调整界域,往往纠纷迭起,经年不结,甚或两县人民因此发生嫌怨,各走极端,影响殊大。”^[26]²⁴³1948年1月,四川省政府旧事重提,再次指出过去几年中“调整各县插花飞地”,由于地方人士“时持异议,以致纠纷迭起,经年不决”^[27]²⁶⁴。因四川省政府难以避免划界纠纷陷入“经年不决”的困境,其时国民政府推行县级政区调整的实际成效并不明显。

[参 考 文 献]

- [1] 武心群,夏军.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县制实施后县及县以下行政区域的变更[J]. 民国档案,2009(4).
- [2] 资阳县政府档案(1940年6月2日). 四川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字第01316号训令(档案号:4-1-163)[A]. 资阳市雁江区档案馆.
- [3] 蓬安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940年7月10日). 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字第3823号训令(档案号:2-2-146)[A]. 蓬安县档案馆.
- [4] “改划县区、增设县治办法”参见蓬安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940年5月). 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字第3328号代电(档案号:2-2-146)[A]. 蓬安县档案馆.“整理各县县界办法”参见蓬安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940年5月). 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字第3306号代电(档案号:2-2-146)[A]. 蓬安县档案馆.
- [5] 蓬安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940年6月). 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字第3541号代电(档案号:2-2-146)

[A].蓬安县档案馆.

[6]蓬安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940年8月16日).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字第4329号代电(档案号:2-2-146)[A].蓬安县档案馆.

[7]蓬安县政府民政科档案(1940年9月13日).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字第4739号快邮代电(档案号:2-2-146)[A].蓬安县档案馆.

[8]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0年11月20日).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一字第5674号快邮代电(档案号:054-03-8739)[A].四川省档案馆.

[9]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1年1月22日).四川省第十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民字第206号呈文(档案号:054-03-8739)[A].四川省档案馆.

[10]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0年12月11日).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32159号指令(档案号:054-03-8739)[A].四川省档案馆.

[11]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1年3月11日).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06939号指令(档案号:054-03-8739)[A].四川省档案馆.

[12]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1年3月11日).四川省政府调整各县县界核准各县应行划出各地一览表(档案号:054-03-8739)[A].四川省档案馆.另参见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1年3月11日).四川省政府调整各县县界核准各县应行划入各地一览表(档案号:054-03-8739)[A].四川省档案馆.

[13]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2年).四川省政府三年来调整县行政区划经过(档案号:054-04-9066)[A].四川省档案馆.

[14]资阳县政府档案(1941年4月).四川省政府民三字第10202号训令(档案号:4-1-163)[A].资阳市雁江区档案馆.

[15]南部县政府档案(1941年6月19日).南部县第二区河坝乡公所呈文(档案号:22-1667)[A].南部县档案馆.另参见南部县政府档案(1941年8月14日).南部县第二区王家乡公所呈文(档案号:22-1667)[A].南部县档案馆.

[16]阆中县政府秘书室档案(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39182号指令(档案号:346-1-17)[A].阆中市档案馆.

[17]阆中县政府秘书室档案(1941年11月).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39496号指令(档案号:346-1-17)[A].阆中市档案馆.

[18]南部县政府档案(1942年12月21日).南部县政府民字第1610号呈文(档案号:22-无目录号-681)[A].南部县档案馆.

[19]阆中县政府秘书室档案(1944年2月).双柏垭民众代表向苇溪等人呈(档案号:346-1-17)[A].阆中市档案馆.

[20]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2年7月).南部县第四区枣碧乡双柏垭第十三、十四保民众代表向隅、张俊乔等请愿书(档案号:054-03-8738)[A].四川省档案馆.

[21]四川省政府民政厅档案(1943年2月).南部县政府民字第357号呈(档案号:054-03-8730)[A].四川省档案馆.

[22]阆中县政府秘书室档案(1940年8月25日).信件(档案号:346-1-18)[A].阆中市档案馆藏.另参见资阳县政府档案(1940年8月22日).信件(档案号:4-1-163)[A].资阳市雁江区档案馆.

[23]阆中县政府秘书室档案(1943年12月).老鸦乡高观寺民众赵映金、赵子金等7人行行政状(档案号:346-1-17)[A].阆中市档案馆.另参见阆中县政府秘书室档案(1943年11月20日).老鸦乡高观寺民众赵应金、赵子金等20人呈(档案号:346-1-17)[A].阆中市档案馆.

[24]南部县政府档案(1948年8月30日).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21949号训令(档案号:22-无目录号-207)[A].南部县档案馆.

[25]潘艳丽.晚清民国时期丰都、石柱、忠县三县之间飞地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8.

[26]资阳县政府档案(1946年9月).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21687号训令(档案号:4-1-162)[A].资阳市雁江区档案馆.

[27] 资阳县政府档案(1948年1月). 四川省政府民一字第00105号训令(档案号: 4-1-162) [A]. 资阳市雁江区档案馆.

The Adjustment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s Carried out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uring the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Anti-Japanese War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11th District Office of Sichuan Province

He Kai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1940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ew county system" need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began a large-scale restructuring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s. The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issued a directive on March 11, 1941, confirming that the offi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on commissioner of the 11th district of Sichuan province had approved a total of 44 regions that should be adjusted in each county, accounting for about 15.3% of the total number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pproved and adjusted by the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during this period. After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related historical fact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the adjustment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t that time has several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adjustment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is mainly aimed at the "flower arrangement", "enclave" and "embedded land" in the border area of two counties. Secondly, the adjustment of county-level government and district resulted in many disputes. Furthermore, there are complex and diversified interest games among various interest su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the adjustment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s. Despite repeated urging and enforcing by the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adjustment in all counties was not effective. As the rear area of Anti-Japanese War and the base for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e adjustment of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s carried out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ichuan is representative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county-level administrative area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adjustment; county line disputes; flower arranging enclave

[责任编辑:左福生]